

对汉字语境下文学翻译与解构主义的思考

张传彪

(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疆石河子 832003)

摘要: 表意汉字具有不随语音变化而变化的属性, 英语则相反; 汉语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之处在于前者具有共时态特点, 而后者则是历时态。比较汉英两种语言文字的本质特征,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汉字写意语境下, 后现代解构主义对翻译的“忠实”标准与文学翻译本身之解构, 纯属无稽。

关键词: 表意文字; 解构; 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7)06-0062-06

当下译界“解构”之风日甚, 谈“在场”、“延异”、“能指符号”, 似乎言说主流话语。谈“信”、“忠实”、“神似”, 则是言说边缘话语。人们不禁困惑, 在截然迥异于西方写音语境的汉字语境下, 后现代解构主义对文学翻译到底有多少理论指导意义? 本文试图从文字的源头质疑后现代解构主义在东方写意语境下“操刀解构”的理据性、科学性和实用意义。

一、从汉字语境看德里达的 difference “文字游戏”

德里达对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 发轫于其所杜撰的 difference 一词。这是一个在西方写音语境下可以读、可以写, 但不能够听, 也不能够在言说中被理解的毫无意义的自由符号。一个子虚乌有之词居然可以导致西方诗学形而上学的思想大厦倾刻动摇, 这在普通中国人听来简直无异于天方夜谈。然而, 正是这个肇始于 difference 的文字游戏成就了一代宗师的解构主义哲学阐释学, 并从根本上引发了一场让西方哲学界、诗学界、美学界的学者、哲人们灵魂震荡的大地震。

笔者暗自设问: 如果中国也出一个德里达, 也采用类似 difference 的汉字游戏, 此君能在写意语境下建构起自己的某个理论体系吗? 或者颠覆东方大陆哪怕最不起眼的哲学命题吗? 在德里达眼里, 两千多年来西方文化始终没有摆脱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和在场形而上学的困扰。在西方, 阐释主体言说所表达的“意义”即是“在场”, “在场”的“意义”源于“逻各斯”, “逻各斯”的本质是语音。而西方拼音文字则是对逻各斯“言说”的声音的书写与记录。这, 便是德里达为什么要生造出一个 difference 的根本原因, 目的就是要使书写脱离挟带意义的语音, 最终使书写成为远离“逻各斯”中心意义的外在衍生物。换句话说, 就是要让书写摆脱语音的控制, 使言说与书写之间因“延迟”而产生“差异”。

现在让我们把视野收回到东方大陆的汉字语境。在华夏五千年文化传统中, 有谁能找到一个

收稿日期: 2007-03-09

基金项目: 宁德师范高等学校校级重点项目(2006001)

作者简介: 张传彪(1948-), 男, 福建连江人, 教授, 研究方向: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

类似西方形而上学的先验中心可供解构？没有。有谁能找到一个具有终极性话语权力的语音中心值得解构？没有！试问，在没有终极标靶的东方语境下，硬是找来一个文学文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或是硬把跟什么“中心”都沾不上边，纯属翻译伦理标准的“信”与“忠实”解构得死去活来，意义何在呢？

德里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因为西方文化传统中确实存在着形而上学的声音秘密：逻各斯的“思”(thinking)和逻各斯的“言说”(speaking)正是以声音使意义呈现为当下的在场(presence)。所以，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西方在场形而上学只需让书写脱离语音，让“逻各斯”意义的“在场”失效就成功了。

反观汉字汉语，无论表意的“象形”、“指事”、“会意”字，还是表音的“形声”、“假借”字，它们的符号功能都是区别意义而不是区别语音的。也就是说，汉字对应的是语言的精神世界——语义系统，而不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系统。汉字并不表音值。在汉字语境下，意义的呈现主要靠书写的符号化象征，语音不过是附属物。思考到这里，结论已跃然纸上：类似 difference 的文字游戏在东方大陆根本不可能重演。甚至连炮制出一个可以读、可以写，但不能够听，也不能够在言说中被理解的汉字都做不到。退一万步说，就算能勉强凑合出这样一个汉字，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用它来颠覆老庄之“道”？还是用它来解构《四书》、《五经》？须知，在汉字语境下，意义是受制于书写的，而且书写对意义的控制很多时候是在超越和无视语音之下完成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主宰中国语言书面表达数千年的“文言文”甚至完全脱离了口头语言。

其实，就连汉译 difference 一词都谈何容易。德里达生造该词的目的是为了使 difference 摆脱 difference 的意义羁绊，使其成为一个既是毫无意义的书写符号，又能展示其与 difference 的书写与意义之间产生的“延宕”与“差异”。严格地说，该词根本不可译，无论怎么译都不对。理由无他：汉字中绝对找不到读得出其音，却道不出其义，也没有其字的汉字！而 difference 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拼音字！

中、西方文字如此迥异，以颠覆“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为宗旨的后现代解构主义又怎么能够在汉字语境下演绎其在西方曾经有过的辉煌呢？

二、对中、西方文字本体性差异的思考

一位学者在《外国语》2005年第3期上撰文，郑重引述伽达默尔所言：“没有什么东西有如文字这样生疏而同时需要理解。甚至与操陌生语言的人接触，也不能与这样一种生疏性和陌生性相比较。”^[1]这样的观点出自西方人之口可以理解，由汉语母语者推崇并引进就不可思议了。试想，汉字果真如此“生疏”且“陌生”，又何来孔子《论语》、李杜诗篇的千年流传、脍炙人口？

在西方，文字摹写语言，只是“符号的符号”。所以，西方语言历来凌驾于文字之上。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就指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语说的词的结合，而是后者单独构成的。”^[2]在中国，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恰恰颠倒过来。汉语中，“书写的词”远比“口语说的词”更具规范性和权威性。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汉字还不仅仅是汉语的书写符号，它通过“象形”、“指事”、“会意”等直观方式直接与汉族先民的具象思维、思想观念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客观事理相联系。所以许国璋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3]

众所周知,组成拼音文字的一个个字母代表的是音素的语音形象,因声赋形。拼音文字与其所指事物之间不存在理据,其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性的。以形写意的汉字则“渊源于客观实体,其结构与生活真实间存在着暗喻关系,其能记与所记之间存在着理性的,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4]作为表意文字,汉字的形体与语音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标记关系。换句话说,汉字的书写形式并不表音值,而是直接表示那个字所指的概念。

正由于拼音文字对其使用者只是表示声音的符号,所以西方文字在时间的长河里随着语言和语音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出现更新、淘汰也就在情理之中。布龙菲尔德说,“詹姆士王的圣经译本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英语同今天的英语不一样,十四世纪诗人乔叟的英语,我们今天非得对照词汇,借用专门词典才看得懂。九世纪阿尔弗雷德大帝时的英语手写本留存到今天,对我们似乎便是另一种外语。”^[5]从这个意义上讲,伽达默尔的“没有什么东西有如文字这样生疏”的说法不无道理。

反观汉字,情形正相反。根据美国学者伊斯特林,汉字不仅字形稳定,而且“意义约定具有数学、化学、天文学、物理学以及其它学科符号的共通性质”^[6]。跟阿尔弗雷德大帝几乎同时代的唐诗宋词,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一点也不陌生。为什么同样面对各自语言中的古代文本,中国人读起来并不吃力,而英美人却不知所云?这到底是解构主义所谓意义的“延异”在起作用?还是汉英两种文字的本体性差异导致的结果?答案不言自明。虽然岁月流逝也给部分汉字带来某些变化——或被改变原义,或被赋予新义,但跟西方文字根本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字义变化一般都能够追本溯源。更重要的是,作为书写符号,这些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象征性、依存性、动机性联系并没有因为意义的改变而改变。

除了汉、英两种文字的本体性差异,中西方民族对待各自书面语言的态度也大相径庭。西方民族推崇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鄙薄文字,讥之为“为语言符号服务的工具”,“能指的能指”^[7]。柏拉图甚至把文字比作小孩子的发明,而把言语称作大人的智慧。中国人则不同。千百年来华夏民族对经学顶礼膜拜,对古代典籍的训诂、注疏从不间断,以古释今蔚然成风。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汉字意义的稳定性。许慎的《说文解字》对汉字的分析和说解就是以小篆为主参以古籀进行的,小篆即秦代统一的文字,古籀则是更古老的汉字。而《说文》至今还依然是许多文人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借用解构主义的一个时髦术语,这是不是可以称之为古今一脉的“在场”(presence)?涵咏于这样的治学氛围和文化心态,中国人尊重、珍惜并维护从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使汉语文化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共时态特点。

面对五千年一脉相传的汉字,伽达默尔关于文字“陌生性”的结论是不是显得过于偏狭,甚至浅薄?

三、文学拒绝“解构”

德里达不是一个文学家,也从来不是一个翻译家。他对翻译问题的兴趣不为别的,就是要借助翻译来论证“意义和原义的不确定性”;借助翻译来证明解构主义语境下“无可以译者,无可译者”(Nothing is translatable; nothing is untranslatable)的悖论;以及“真理的相对性和无终结性”,进而最终颠覆西方古典在场形而上学的中心和本源。奇怪的是,这样一位跟文学素无渊源,对文学翻译并无多少感性经验的哲学家,其哲学阐释学理论却被某些东方学人全盘借渡到其本人无比陌生的汉字语境中,对中国传统文学翻译理论大开解构主义“杀戒”。

《中国翻译》2004年第6期上一篇题为《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以下简称《解“忠”》)的宏篇大论,对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信”与“忠实”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构。文中有这样一段话^[8]:

在解构主义追问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之前,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翻译学想当然地假定了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指涉关系。……德里达认为,这个在脑海里被能指唤起的意象根本就不是真实世界里的那个物;能指所指涉的那个事物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指),一个虚幻的在场,一个不在场的在场,一个在场的替代物,实际的事物其实根本就没有因为书本里的白纸黑字的符号而栩栩如生地在于读者眼前,能指只是再现了不在场的在场,取代了在场的地位。”

在接下来的一段里,作者特别举出金庸小说中的“倚天剑”和“屠龙刀”为例,以证明“能指与所指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不稳定的延异关系。”

文章作者所要竭力解构的是文学翻译中的“忠实”原则。然而,他却忽略了一个不该忽略的常识:文学作品纯属作家心灵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并无“精确”可言。在纯属虚构,根本不追求“精确”的文学领域,对翻译的“忠实”性进行数理逻辑意义上的证伪,这种精密严谨的方法论显然用非是处。语言大师周汝昌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9]:

“苍茫”是什么?西文译时,必曰“不清楚”云云。杜少陵名句:“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你能译成“精确”的西文吗?那苍茫,从落日平西的时光感,从出门之后无所归宿的孤独感,直到战乱世界、忧患人生之悲天悯人之大慈大悲感,都在那二字之中传诉于古今读者的耳边心内。……

我此际为文春寒尚觉“料峭”,西文没有,怎么办?用“气温计”数据表述吗?“杨柳依依”,“依依”怎么译成外文?洋人看见柳树,发生“依依”感吗?

这,大概是对解构主义所谓“能指与所指之间”无法保持“稳定的指涉关系”的一个辛辣讽刺!其实,王东风的《解“忠”》还忽略了另一个事实:文学翻译中的“信”与“忠实”到底是用来具体操作的技术性翻译标准?还是仅仅一个模糊的伦理“标准”?若是前者,仅有一、两个字的箴言式感悟如何定“标”?如何为“准”?其作为“标准”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又从何谈起?若是后者,“伦理”无法量化,“忠实”难以界定,优劣得失自在人心,毫发纤细般解构显然小题大做。

说到“忠实”的界定,还不得不问:文学翻译到底要忠实于什么——原文信息?原文意象?原文韵味?原文境界?原文字数与音节?……从“忠实”的定义讲,这一切都得“毫发不差”才称得上数理逻辑意义上的“忠实”。而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肯定不是在翻译。那是用同一种语言照原样复述!

谁都知道,文学文本充满隐喻、夸张、歧义、象征、空白、“不定点”等艺术表现手法。对于本来就是以扭曲言语、异化意义、制造朦胧、含蓄与陌生化效果为己任的文学语言,怎么能够以原子般精确来要求其“能指”与“所指”丝丝入扣呢?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意境清新悠远。可一旦跟解构主义的“延异”、“能指”、“在场”、“不在场”扯上关系,恐怕就没有一个读者能说得清了——“黄鹂”是不是当年杜甫所见的“那个物”?“翠柳”怎么可能“翠”到今天?那么,此“柳”非彼“柳”,此“鹂”非彼“鹂”,只能算是“不在场的在场”!此外,“一行白鹭”多少只?公鹭还是母鹭?大鹭还是小鹭?羽毛纯白还是花白?雪白还是灰

白?……文学是经不起解构的,一经穿凿,便成滑稽。实际上,正是因为严格意义上的精确、忠实难以做到,才有傅雷、钱钟书的“神似”说与“化境”说。可惜,解构主义者关心的不是文学语言的自身规律,而是意义的“延异”与“能指符号的滑动”。在他们眼里,对“不在场的在场”的“替代物”验明正身,似乎比文学作品的美学追求更重要。

回到《解“忠”》中所举的“倚天剑”和“屠龙刀”。假如需要将它们译成英文,该怎么办?是抛开“在场”、“不在场”的无谓纠缠,以“虚”对“虚”地译?还是先找来实物,量好尺寸,以“实”对“实”地译?倘若“虚”译,则“脑海里被能指唤起的意象根本就不是真实世界里的那个物”^[8];倘若“实”译,这剑和刀的来路就有问题,因为“这两样兵器皆是金大侠的杜撰之物,他自己都没见过,根本没有在场的可能性”^[8]。呜呼,从译者而今之后还有活路没有?

坦率地说,读完《解“忠”》总觉一头雾水,不明白作者洋洋千言的解构目的何在?是为了证明翻译不可能有“忠实”吗?那么,取代“忠实”的又该是什么?此时,笔者耳边似乎响起了“翻译即操纵”、“翻译即背叛”的熟悉呐喊。翻译既然可以“操纵”,可以“背叛”,还需要对传统译论中的“信”与“忠实”大加挞伐么?不过话说回来,王东风教授并没有这般偏激,他对此的回答是:“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8]

妙哉!解构了半天又回到了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忠实”上,即: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忠实于“保留”其“差异”!只是这“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跟老生常谈的“直译”又有什么本质不同呢?“直译”可是支谦、鸠摩罗什他们一千多年前就提到过的翻译策略啊!

《解“忠”》的确是一篇雄辩之作。它之所以会出现如此逻辑混乱,绝不是因为作者考虑欠周,而是解构“忠实”压根儿找错了对象!文学从根本上说就不该被解构!文学作品犹如一件艺术品。你可以从一件艺术品中解构出各种各样最细微的要素,但这些要素加起来却成不了一件艺术品。正如一位学者指出:“对于文学艺术这种不可分的气韵生动的生命形式,硬要从中一刀切开,……显然是一种可笑的机械性思维。”^[10]同样的道理,文学翻译也应该拒绝解构,道理很简单:文学文本本身就是个充满虚构情节、微妙情感、创意表达的美学世界,翻译又怎么能做到处处精确、字字对应呢?刘宓庆说得好:文学的“模糊性审美构成(意境、神韵等)是非定量的、流变的,可以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1]而更为重要的是,“气韵生动的生命形式”永远不可能在“解构”中诞生。天底下至今也找不到哪位译者在需要时时顾盼“能指”与“所指”、“在场”与“不在场”的诚惶诚恐中,靠着“撒播”“踪迹”,译出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来。

四、结 语

后现代解构主义在质疑文本的终极意义,强调翻译中意义的“延异”与“再生”,解释隐在非“所指”因素,以及彰显译者的创造性与主体性等方面,确实为中国传统翻译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孕育于西方语言、西方哲学、西方思维、西方“逻各斯”传统的后现代解构主义,在东方汉字语境下难免会有“水土不服”的现实问题。对于这一点,解构主义宗师德里达十分清醒。“德里达本人再三强调他的解构策略是指向西方诗学文化传统的‘写音语境’的,而且强调他的解构策略也仅仅是在语音书写系统中运作的。”^[12]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一些东方弟子却亟欲在大师不敢涉足的写音语境之外打出一方天地来。作为学术探索,这种精神当然值得鼓励。但在借鉴、引进西方学术思想之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保持一份清醒、客观和科学意识呢?

参考文献

- [1] 刘云虹. 意义与翻译批评研究[J]. 外国语, 2005, (3): 37-42.
- [2] [瑞士]索绪尔(高名凯译).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47.
- [3] 许国璋. 许国璋论语言[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1. 74.
- [4] 张传彪. 诗笔·译笔·钝笔[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5. 14.
- [5] 马钦忠. 中西文字在文化传递过程中的作用[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 (3): 16-20.
- [6] [苏]B. A. 伊斯特林(左少兴译). 文字的产生与发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100.
- [7] 褚孝泉. 语言哲学: 从语言到思想[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156.
- [8] 王东风. 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 中国翻译, 2004, (6): 5-11.
- [9] 周汝昌. 思量中西文化[J]. 文汇报, 1999-05-30(6).
- [10] 顾祖钊, 郭淑云. 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73.
- [11] 刘宓庆. 翻译美学基本理论构想[J]. 中国翻译, 1986, (4): 16-21.
- [12] 杨乃乔. 比较诗学与他者视域[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 517.

Thinking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Deconstruction Theory from the Angl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ZHANG Chuanbiao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China 832003)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English alphabetic writing system, the Chinese ideographic writing system does not alter its characters along with sound changes. Chinese culture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cultures in many way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being that the former is synchronic while the latter chronic. Based upon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there is no point at all in deconstructing the translation criterion of faithfulness and literary language itself as long as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involved.

Key words: Ideographic writing; Deconstructivism; Literary translation

(编辑: 刘慧青)